

# 「韓門弟子」考論\*

錢得運

清華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 引言

「韓門弟子」這一名稱在中唐之時即已出現。隨著韓愈(768–824)在晚唐五代地位的升降以及唐代古文運動的消長，其涵義及影響力亦隨之變化；至宋代歐陽修(1007–1072)時，其涵義得以基本確定，大致成為宋以後至今所共循之義。從「韓門弟子」涵義的歷史變化來看，它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即與科舉緊密相關的原初意義逐漸隱晦，而道統與文學方面的意義漸趨突出。學界在運用「韓門弟子」這一名稱概念時，並沒有過多關注其涵義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變化特性，因此本文注重探討這一涵義變化以及定型的過程及其意義，以供學界參考。

## 中唐之時「韓門弟子」的提出及其意義

「韓門弟子」之稱最早見於李肇《唐國史補》：「韓愈引致後進，為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時人謂之韓門弟子。愈後官高，不復為也。」<sup>1</sup>李肇與韓愈生平相近而略後，因此像《唐國史補》這種具有補史之遺的著作，頗能準確反映當時情況。《唐國史補》所謂後進之士的「投書請益」，其意大致分為兩種：(一)後進之士攜其平時作品作為謁見韓門的試金石或見面禮；(二)後進之士跟隨韓愈學習科舉方面的實際寫作內容或考試技巧。正如他人所論，韓愈識才，比許多人更懂得科舉學問。<sup>2</sup>李肇沒有論及韓愈何時開始引致後進，僅言其官高不復為，這固可作為韓愈不再引致後進的一個原因，也可理解為他不復引進的時間下限。

李肇所論簡略，只是將當時這一社會現象作一簡要記述，僅言「韓門弟子」形成的時間是在其「官高」之前。「韓門弟子」的涵義是否如李肇所論那樣一成不變？韓愈

---

\* 本文承蒙學報三位匿名審稿專家提供寶貴意見，筆者獲益匪淺，謹此致謝。

<sup>1</sup> 李肇：《唐國史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卷下，頁57。

<sup>2</sup> 參閱劉海峰：〈「韓門弟子」與中唐科舉〉，《漳州師院學報》1997年第3期，頁18–26。

究竟甚麼時候開始「引致後進」？他為何樂於引致後進？他的這種行為有何意義？對於這些問題本文嘗試作出解釋。

以下略考韓愈生平。韓愈貞元三年(787)初到長安，第一次參加進士考試，直到貞元八年(792)第三次考試中登進士第。貞元六年(790)，韓愈投書刺史賈耽，獻文十五篇。韓愈登第後，緊接著參加吏部博學宏詞科的考試，其間上書當時宰相賈耽、盧邁等，有〈上宰相〉三書。科考、干謁未果，最後通過進董晉幕、張建封幕開始了他的仕宦經歷。從貞元三年開始科舉考試到貞元十二年入董晉幕前的這幾年間，韓愈「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sup>3</sup>和當時許多士子一樣，韓愈有過困頓場屋、干謁無果的辛酸經歷。這種痛切的人生經歷，使韓愈對像他這樣的人有更深同情，影響到他以後積極推薦青年才俊。就在這段「己欲達而達人」的時期，韓愈與同樣應舉未第的孟郊(751-814)訂交。韓愈對當時落第的孟郊抱有同情心，並作〈長安交遊者一首贈孟郊〉等詩安慰孟郊。孟郊後來東歸，韓愈積極推薦他到張建封處求舉薦，其〈孟生詩〉有云：「奈何從進士，此路轉嶮嶽。……我論徐方牧，好古天下欽。……既獲則思返，無為久滯淫。卞和試三獻，期子在秋碣。」<sup>4</sup>孟郊在〈答韓愈李觀別因獻張徐州〉詩中說：「故人韓與李，逸翰雙皎潔。哀我摧折歸，贈詞縱橫設。」<sup>5</sup>可見韓愈與孟郊一見傾心，並為其仕途積極謀劃。之後，韓愈對於友朋、後進都傾心舉薦。以下臚列韓愈在引致後進方面具有典型意義的事件：

貞元十四年(798)，韓愈於董晉幕府任將仕郎秘書省校書郎。韓愈在汴宋毫穎觀察推官時，十一月主汴州貢士舉考，權秀才中選，張籍(768?-830)中選得首薦。而韓愈第一次大規模地「引致後進，為求科第」，是在貞元十八年(802)，時任國子監博士。這一年，韓愈向當時佐助權德輿典貢舉的祠部員外郎陸俊寫了〈與祠部陸俊員外薦士書〉，舉薦侯喜等十位科考士子。韓愈推薦的這些士子，都是當時的青年才俊。韓愈在文章中既品藻他們的學優行正，也建議主考官予以錄取，以獲「收人望」、「得才實」的美譽。<sup>6</sup>《唐摭言》卷八「通榜」條說：「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俊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人於俊，其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紆，其次六人：張苴、尉遲汾、李紳、張浚餘，而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而苴、紳、浚餘不出五年內，皆捷矣。」<sup>7</sup>由此也可印證出《唐國史補》所說的「投書請益」之人，多為求科第而拜謁於韓門以求引薦者。可以說，韓愈在貞元十八年的成功推薦，為其薦賢的聲譽贏得了良好的評價，正如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五「宋科場處分之輕」條所說：

<sup>3</sup> 韓愈：〈上宰相書〉，載劉真倫、岳珍(校注)：《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646。

<sup>4</sup> 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12。

<sup>5</sup> 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頁329。

<sup>6</sup> 《韓愈文集彙校箋注》，頁825。

<sup>7</sup> 王定保：《唐摭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卷八，頁82。

「韓愈負文名，遇舉子之有才者輒為延譽，並言於知貢舉之人，往往得售，故士爭趨之。」<sup>8</sup>即便在晚唐五代，韓愈在貞元十八年的薦舉之事仍為士子所津津樂道，可見韓愈在薦士方面影響久遠，同時也反映出唐代舉子科考中希望舉薦成功的意願是何等迫切！

貞元十七、十八年是韓愈思想的發揚時期，也是他仕宦經歷的轉折時期，同時也是他開始大量「引致後進」最為關鍵、最具代表性的一年。韓愈一生四為博士：貞元十八年調授國子四門博士，元和元年(806)召為國子博士，元和二年(807)分教東都生並於次年改為真博士，元和七年(812)自尚書職方員方外郎下遷為國子博士。可以說，韓愈四為博士的這些經歷，既是他仕途迂進的體現，也是他從這個時期開始直至任國子博士至國子祭酒期間「引致後進」的重要時期。許多學子來向韓愈求教，而韓愈也乘職責之便利大量招致後進。韓愈得博士職位之便，倡儒學思想之盛，並且以其敢為天下師的精神廣召後學，為他們傳道授業。另外，韓愈貞元十九年(803)年的陽山之貶以及元和十四年(819)的潮州之貶，雖為人生重大的遭際挫折，但他體現出來的人格魅力以及正義精神卻為當時廣大士子所稱賞，這無形中加重了他在士子中的光輝形象，為他贏得了聲名，成為他招致後進的又一大因素。

韓愈任職國子祭酒之職後，雖有改任等事，但李肇所謂的「官高」情況未有多大變化，故而可認定韓愈不再像以前真正引致後進的時間正是其罷國子祭酒之任後，即長慶二、三年(822-823)之後。在任職國子祭酒期間，韓愈大力振興教育，觀其在職期間所上的〈請復國子監生徒狀〉、〈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舉薦張籍狀〉等文章，可見韓愈對國子監進行大力整頓，結果使國子監得以振興。正如李翱(772-841)〈韓吏部行狀〉所述：「有直講，能說《禮》而陋於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能賤直講。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問，皆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sup>9</sup>由此可見，在這不足一年的任職期間，韓愈借其國子監學官的身份，又一次發揮他振興學術的才能，這自然會得到許多有才之士和貧寒子弟的認可和尊崇。這裏可舉一些相關例子：

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俟見焉。<sup>10</sup>

<sup>8</sup> 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542。

<sup>9</sup> 李翱：〈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載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卷九七六，頁十一上(總頁5139)。

<sup>10</sup> 韓愈：〈答陳生師錫書〉，載《韓愈文集彙校箋注》，頁731-32。

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至乎至也。然閱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sup>11</sup>

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sup>12</sup>

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sup>13</sup>

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sup>14</sup>

堅以進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士，堅為生，生與博士為同道。<sup>15</sup>

〔劉〕伉喜古文，以吾所為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然則吾之所為文皆有實也。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sup>16</sup>

舉進士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sup>17</sup>

劉巖夫元和十年(815)中舉，據方崧卿繫年，韓愈〈答劉巖夫書〉作於元和七年至十年間。韓愈元和七年任國子博士，元和十年任考功郎中、知制誥。這幾年，正是韓愈大力引進人才，而且士子也求教於韓愈的重要時期。舉進士求於韓門，但其所教者又是古文之道，據此可知韓愈借舉進士之法來誘之於文道傳授。韓愈此舉可謂事理雙具，縮仕進與文道於一途。正如何焯所說：「然則韓門弟子皆慕勢而來者耶？何言之陋也。」<sup>18</sup>何焯批評將「韓門弟子」狹隘地定義成為求科第而來的慕勢之人。這種

<sup>11</sup> 韓愈：〈與馮宿論文書〉，載《韓愈文集彙校箋注》，頁817。

<sup>12</sup> 韓愈：〈與孟簡尚書書〉，載《韓愈文集彙校箋注》，頁888。

<sup>13</sup> 韓愈：〈送孟東野序〉，載《韓愈文集彙校箋注》，頁983。

<sup>14</sup> 韓愈：〈送牛堪登第序〉，載《韓愈文集彙校箋注》，頁1051。

<sup>15</sup> 韓愈：〈送何堅序〉，載《韓愈文集彙校箋注》，頁1090。

<sup>16</sup> 韓愈：〈題哀辭後〉，載《韓愈文集彙校箋注》，頁1296-97。

<sup>17</sup> 韓愈：〈答劉巖夫書〉，載《韓愈文集彙校箋注》，頁865。〈答劉巖夫書〉，他本亦作〈答劉正夫書〉。

<sup>18</sup> 何焯：《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三二，頁558。

將表象作為本質，橫加評說的言論，自然有失原義。韓愈在〈與祠部陸俊員外薦士書〉一文稱許的這些青年士子，他們共有的特點是詩文「有可取」之處，且有一定的文學素養。從以上這些材料可以看出，這些向韓愈求教的士子，其「請益」的內容很豐富，既有文學創作、文學思想的交流，又有儒家思想方面的探討。林紓〈韓文研究法〉說：「昌黎懷才不遇，間有人叩以文章，則昌黎報書，其語必與仕進相關係。」<sup>19</sup>韓愈固然樂意幫助後進，為其舉薦播揚聲名，同時更為積極地利用這些才俊來擴大古文運動的影響力，欲使儒學得以復興，儒家思想能夠得以傳承。實際上，韓愈引致後進以擴大其宣傳思想的目的，而後進之士也樂於通過韓愈的教導幫助來考取科舉，韓愈與這些士子因科考舉薦締結到一起，和衷共濟。因是之故，諸多士子聚攏在韓門，成為當時一特出現象。

韓愈所處中唐之時，人們的門人意識很強烈，主要體現為因科舉而結成的門生與座主的關係。這種關係極為嚴格，導致後來門生與座主之間的利益互助關係變成朋黨的性質，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牛李黨爭中的對內團結、對外鬥爭。但在唐代因學術傳承而結合起來的團體，門人關係並不見得有多嚴格的分別。《新唐書·元德秀傳》云：「是時程休、邢宇、宇弟宙、張茂之、李粵、粵族子丹叔惟岳、喬潭、楊拯、房垂、柳識皆號門弟子。」<sup>20</sup>這是當時人出於對元德秀人格的尊崇而願為其門下弟子。然而像「門弟子」這樣的稱呼在唐人中並不多見，翻檢韓愈文集，只發現以下兩則材料：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sup>21</sup>

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sup>22</sup>

「門人」、「弟子」早見於《論語》，<sup>23</sup>「門生」一詞則見於《後漢書·賈逵傳》：「詔諸儒各選高才生，……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sup>24</sup>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引歐陽修《集古錄·孔宙碑陰跋》云：「親受業者

<sup>19</sup> 林紓：《韓柳文研究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韓文研究法〉，頁16。

<sup>20</sup> 宋祁、歐陽修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一九四，頁5564。

<sup>21</sup> 韓愈：〈送王墳秀才序〉，載《韓愈文集彙校箋注》，頁1114。

<sup>22</sup> 韓愈：〈送浮屠令縱西游序〉，載《韓愈文集彙校箋注》，頁3132。

<sup>23</sup> 參劉寶楠：《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51：「《論語》中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又，頁153：「《正義》曰：『門人』者，謂受學於夫子之門之人也。下篇『子路使門人為臣』，『門人欲厚葬之』，『門人不敬子路』，又《孟子》言『門人治任將歸』，皆是夫子弟子。惟曾子謂門弟子，則曾子門人。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則子夏弟子也。」

<sup>24</sup>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三六，頁1239。

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sup>25</sup>在漢代，「弟子」、「門生」的區別還是很明顯的。後來「門生」、「門人」、「弟子」之間差別已不明顯，其意大致相同，即為受業弟子。在唐代的科舉考試中，考官稱為「座主」，同年考中的進士則自稱「門生」，這是一種近乎感恩性質的稱謂，多與學問道義無關。

「華夏學術最重傳授淵源，蓋非此不足以徵信於人，觀兩漢經學傳授之記載，即可知也」。<sup>26</sup>韓愈集中出現了「門弟子」、「門下」、「門人」等稱謂，如其〈送王秀才序〉中「門弟子」的稱謂關乎師道傳承之義。韓愈的「門弟子」意識與其師道觀念緊密聯繫。韓愈致力於儒家思想的振興，以繼承孔、孟、揚雄以來所缺失的儒家傳統為旨歸。在中唐師道墮落之時，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招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的氣魄，<sup>27</sup>既遵孔孟之道，又秉承孔孟的傳授理念，以「樂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元人蘇天爵語）的理念自勉，注重並效仿孔孟先賢的聚徒授學傳道方式，改變「舉世不師」、「為人師者眾笑之」的時事境況，<sup>28</sup>並利用自己任博士之職的便利以及引薦後學的良好聲望來宣揚師道尊嚴，傳播儒家思想。韓愈的非凡膽識贏得了當時學子的認可，加以為人性格通達，又極關心弟子，所以得到當時人的尊敬和追循。以科舉引薦的效力作為當時最能吸引人的方式，韓愈積極招收後進，可以看作韓愈「引致後進」的一個原因。

至於韓愈不再大力引致後進的原因，我們據其晚年事蹟略作揣測，認為原因大致有四：其一，整體來看，「韓門弟子」中的主要人物已趨消歇，李賀（790-816）、孟郊已歿，張籍失明窮處，李翱自立山頭；其二，長慶二年（822），賈島（779-843）在長安再舉進士不第，以及是年因「科場十惡」發生的遭貶之事；其三，長慶三年李逢吉借韓愈轉官之事欲排擠李紳，使韓、李之間發生「台參」之爭；最後，韓愈晚年廁身於複雜的政局旋渦中，思想趨於保守自固。

### 晚唐五代時期：「韓門弟子」的第一次總結

韓愈發起的古文運動與當時中唐政治時局相關。當社會政治環境發生變化，古文運動亦隨之趨於式微，然影響仍及於晚唐五代，其中較有代表性的當數孫樵。孫樵〈與王霖秀才書〉說：「樵當得為文真訣於來無澤，來無澤得之於皇甫持正〔湜〕，皇甫

<sup>25</sup> 參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三六，頁十六上（總頁438）。《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卷一三四，《集古錄跋尾》卷一，有云：「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授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頁2092）

<sup>26</sup> 陳寅恪：〈論韓愈〉，載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319。

<sup>27</sup>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載《柳河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卷三四，頁541。

<sup>28</sup> 柳宗元：〈師友箴〉，載《柳河東集》，卷十九，頁341。

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sup>29</sup>同樣的意思在其〈與友人論文書〉中再次提及。可見，孫樵清楚指出其師承脈絡，以韓愈為文之道的正統繼承人面目出現，有意表明他是韓愈再傳的嫡嗣弟子。

晚唐時代，尊韓的除孫樵外，尚有皮日休、沈顏、司空圖等人。以皮日休為例，他極為欽重韓愈，其〈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稱：「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以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sup>30</sup>不僅如此，皮日休還仿韓愈「五原」而作〈原化〉、〈原寶〉等「十原」。沈顏為沈既濟曾孫，其〈登華旨〉一文站在儒家的角度對韓愈有別樣詮解，辨李肇《唐國史補》所記韓愈登華山而哭之事。再如司空圖，李石〈西江集序〉說：「唐末司空圖，自以其文出皇甫湜，推而上之，以及於退之，以驗其所傳之自。」<sup>31</sup>

王定保《唐摭言》多記韓愈及韓門情況。是書卷五「以其人不稱才試而後驚」條提及韓愈與皇甫湜面試李賀的天縱作詩能力；卷十「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條則載李賀因其父名諱不能舉進士而韓愈為其作〈諱辯〉；卷六「公薦」條談及牛僧孺謁見韓愈與皇甫湜，以申明此二人為牛僧孺延譽揚名；卷十「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條說孟郊「工古風，詩名播天下，與李觀、韓退之為友」。<sup>32</sup>再結合卷八「通榜」條，會發現《唐摭言》所引韓愈資料，更多地反映出有關唐代科舉舉薦方面的事，涉及韓愈與韓門中人時，多關注於韓愈對後進士子的舉薦獎掖之功，並不著意於韓愈的師道傳承之旨，在這一點上，王定保所論倒與李肇庶幾近之。

此外，《舊唐書》中有許多資料提及「韓門弟子」，卷一百六十〈韓愈傳〉云：

愈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焉。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為事。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女僅十人。常以為自魏、晉已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為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眾，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sup>33</sup>

<sup>29</sup> 孫樵：《孫可之文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第123冊，卷三，頁五下（總頁664）。

<sup>30</sup> 皮日休：《皮子文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九，頁88。

<sup>31</sup> 李石：〈西江集序〉，載《方舟集》，收入《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本，1987年）第1149冊，卷十，頁十八上至十八下（總頁644）。

<sup>32</sup> 王定保：《唐摭言》，卷十，頁116。

<sup>33</sup>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頁4203-4。

《舊唐書》僅言及韓愈「誘厲後進」，並未以「韓門弟子」目之。相比而言，《舊唐書》倒能更深一層地挖掘出韓愈引致後進的原因，認為韓愈之所以能「引致後進」有三點：一是韓愈的弘通性格和為人交往的真誠；二是他汲汲稱薦士子於公卿之間；三是他以雄傑逸眾的文學創新能力以及成功的表現為人所激賞稱道，為後學之士提供了可堪師法的目標和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其「誘厲後進」的目的在於「興起名教弘獎仁義」，且與「韓文」聯繫起來，可以看出韓愈藉著他的古文創作來傳播儒家思想。《舊唐書》所言張籍、孟郊、所誘厲的後進與「後學之士」，大略都在「韓門弟子」範圍內。如果再看《舊唐書》關於李賀、李翱、張籍等人的傳記，就會發現其中無一語提及「韓門弟子」，只是點出這些人與韓愈的交往及深情厚意等。如孟郊、張籍、李翱與韓愈，更側重他們間的友情，那種可謂亦師亦友的關係。如李翱，《舊唐書》即以「韓、李」並稱。《舊唐書·韓愈傳》評價韓愈說：「貞元、大和之間，……韓、李二文公，於陵遲之末，遑遑仁義，有志於持世範，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揚、墨，排釋、老，雖於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sup>34</sup>

考察晚唐五代的文風及時局變化，再結合《新唐書》關於韓愈的評價，可以看出兩《唐書》對韓愈的評價，基於不同的文派立場，「反映了晚唐五代和北宋兩個時代文學創作風氣和批評標準的巨大變化」。<sup>35</sup>宋代歐陽修等人則在古文運動取得勝利的情況下，對韓愈予以高評，而《舊唐書》史臣站在肯定駢體文、近體詩的立場上，對韓愈的評價不高，甚至還有貶辭。《舊唐書》史臣的評價代表了他們所處時代的文風宗尚，正好反映出韓愈及其弟子在晚唐五代的影響趨於沉迷之因。

### 宋人尊韓及「韓門弟子」涵義的定型

清人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宋子京喜韓柳文」條云：「宋子京好韓退之、柳子厚文。」<sup>36</sup>並指出，整部《新唐書》，引用韓愈的文章如〈進學解〉、〈佛骨表〉、〈潮州謝上表〉、〈祭鱷魚文〉等多達十二篇。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尊韓非宋祁筆」條亦云：「韓子在唐雖名高，及唐末已少問津者，直至歐陽公方表章推重。」<sup>37</sup>又，清人姜宸英《唐賢三昧集序》云：「古文自韓、柳始變而未盡，其徒從之者亦寡。歷五代之亂，幾沒不傳。宋初柳、穆明之於前，尹、歐諸人繼之於後，然後其學大行，蓋唐與宋相賡續而成者也。」<sup>38</sup>且不論宋祁尊韓與否，但是自《新唐書》開始，就已重新

<sup>34</sup>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頁4215-16。

<sup>35</sup> 王運熙：〈唐代詩文古今體之爭和《舊唐書》的文學觀〉，載《王運熙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卷，頁393。

<sup>36</sup>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頁330。

<sup>37</sup>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頁637。

<sup>38</sup> 姜宸英：《湛園集》，收入《四庫全書》第1323冊，卷一〈唐賢三昧集序〉，頁十三下（總頁602）。



重視韓愈，並著力提高其相應地位。尤其是歐陽修，繼柳開、穆修等前賢對韓愈的尊崇與學習之後，就韓愈對儒家思想的貢獻，以及在古文運動及創作等方面功績的肯定與推崇，進一步推重韓愈的地位。歐陽修對韓愈作了很高的評價，具體表現在他參編的《新唐書》及其他著作論述中。這裏，我們有必要先引用《新唐書·韓愈傳》中的一段話：

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為服期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sup>39</sup>

細繹此段引文，就會發現修史者有意將「韓門弟子」分為如下幾類：（一）成就後進之士，往往知名於世。這類人正是形成「韓門弟子」的主幹人員；（二）李翱、李漢、皇甫湜等人，即追隨韓愈為文之道的受業弟子；（三）與韓愈交遊的張籍、孟郊這些當時「自名於時」者，追隨韓愈，與其形成一種亦師亦友的關係。《新唐書》所引的這些「韓門弟子」，都是韓門中的佼佼者，包括古文運動中的幹將和「韓孟詩派」中的主要人物。相比於李肇及《舊唐書》，《新唐書》在「韓門弟子」的分類上更為明確且有層次，並且以新朝史書的官方形式再次確立「韓門弟子」的涵義。而且《新唐書》也在他人傳記中一再明確提及其為「韓門弟子」或與韓愈的關係，如：

時又有賈島、劉義，皆韓門弟子。<sup>40</sup>

翱始從昌黎韓愈為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sup>41</sup>

《新唐書》明確將賈島、劉義列為韓門弟子。李翱另設新傳，但表明李翱「從韓愈為文章」，相比於《舊唐書》將韓、李並稱，宋人更申明其文章師承所自，而且也似乎有意不再將韓、李並稱。「對古文派領袖韓愈的評價，兩《唐書》也頗不相同，《舊唐》低而《新唐》高」。<sup>42</sup>可見，至少在宋代歐陽修之時，宋人因尊韓而關注「韓門弟子」，並

<sup>39</sup> 《新唐書》，卷一七六，頁5265。

<sup>40</sup> 《新唐書》，卷一七六〈賈島傳〉，頁5268。

<sup>41</sup> 同上注，卷一七七〈李翱傳〉，頁5282。

<sup>42</sup> 王運熙：〈《舊唐書·元稹白居易傳論》、《新唐書·白居易傳贊》箋釋〉，載《王運熙文集》，第4卷，頁416-17。

加以新的闡釋。其中的原因，固有宋初歐陽修等人提倡的詩文革新運動與其儒學復興有關，而這都在韓愈的身上體現出來。在尊韓的過程中，宋人略去為求科第而形成的「韓門弟子」這一因緣事相，著力突現「韓門弟子」的文學及思想傳承方面的意義。

《新唐書》對韓愈尊崇之情溢於言表，評價韓愈的後世影響時說：「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sup>43</sup>主修《新唐書》的宋祁、歐陽修對韓愈推崇備至，這一點後代學者早已看出。前引錢大昕說：「宋子京好韓退之、柳子厚文。」同樣，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十八「新書好用韓柳文」條云：「歐、宋二公，皆尚韓、柳古文。故景文於《唐書》列傳，凡韓、柳文可入史者，必採摭不遺。」<sup>44</sup>宋代柳開等人對韓愈推崇備至，直到宋祁、歐陽修，韓愈的地位上升並成為極為重要的人物，其儒家思想與文學創作都得到歐陽修的學習。可以說，因歐陽修等人在修史及文學創作等方面尊崇韓愈，極大地提高了韓愈的地位，無形中，像李翱、張籍、孟郊這些人處於陪屬地位，自然被劃分成為韓門弟子。歐陽修反復申說「韓門弟子」、「韓之門人」或「韓門」等，<sup>45</sup>無形中再次強調「韓門弟子」這一群體新的歷史文化涵義。可以說，宋人在修唐史的過程中，對「韓門弟子」的概念進行了一番全新的整合，而後人在泛言「韓門弟子」時往往想到的就是孟郊、張籍、李翱、皇甫湜、賈島等這些韓門名人。而且歐陽修慕韓、學韓，並開展有宋一代的詩文革新運動，培養獎拔曾鞏、蘇軾等文章大家，這進一步提高並鞏固了韓愈在宋代的地位，也使得「韓門弟子」的涵義指稱趨於固定，並突顯出其具有文學功能的弟子式人物。如蘇軾評論韓愈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sup>46</sup>以及張耒、秦觀、韓元吉等人的〈韓愈論〉皆認可其文學功績，而對於其儒家道統思想則有一定的批評。<sup>47</sup>

歐陽修等人對韓愈的推崇使得韓愈在宋代成為時人所積極學習、推崇的先賢，這是毫無疑問的，同時也使得「韓門弟子」的涵義發生了變化，即由原來較為狹義的

<sup>43</sup> 《新唐書》，卷一七六，頁5269。

<sup>44</sup> 趙翼：《廿二史劄記校證》，頁381。

<sup>45</sup> 「韓門弟子」，義見前引《新唐書·韓愈傳》。「韓之門人」，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八：「〈唐胡良公碑〉，韓愈撰。良公者名珣，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歐陽修全集》，卷一四一，頁2273）「韓門」，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八〈唐南嶽彌陀和尚碑〉下：「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蓋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歐陽修全集》，卷一百四一，頁2278）按歐陽修稱柳宗元為韓門之罪人，原因很多，本文不擬細探，但大體來講，這是對柳宗元道統思想不純正的駁斥，同時也有褒韓抑柳的寓意。

<sup>46</sup> 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載《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十七，頁509。

<sup>47</sup> 參閱張耒：《柯山集》，收入《四庫全書》第1115冊，卷三八〈韓愈論〉，頁十六上至十七下（總頁333）；秦觀：《淮海集》，收入《四庫全書》第1115冊，卷二二〈韓愈論〉，頁二下至四下（總頁538-39）；韓元吉：《南澗甲乙稿》，收入《四庫全書》第1165冊，卷十七〈韓愈論〉，頁三四下至三六下（總頁273-74）。

「為求科第」的士子所形成的一種中唐社會現象，演變成一種具有文學創作團體和儒家道統傳承性的團體。孟郊、張籍、皇甫湜、賈島等人儼然以韓門弟子的中堅成員出現，成為統攝於韓愈光輝形象之下的團體人物，這一點可再舉例說明：

〔皇甫〕松，韓門弟子湜之子也。<sup>48</sup>

是時韓愈以文衡輕重天下士，而籍為愈客，且薦於朝，自爾名播人口，一時賢士爭與之遊。其作詩，善樂府，句法出諸客右；觀夫字畫凜然，其典雅幹旋處，當自與文章相表裏，不必以書專得名也。且後世欲見韓門弟子之風采者，當於此求其髣髴。<sup>49</sup>

皇甫湜、李翱雖為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sup>50</sup>

以上所引，多以韓愈為唐代儒學及古文復興的鉅子，所謂的「韓門弟子」，成了跟隨韓愈，承其流而揚其波的群體人物。此外，宋及以後的詩文中，不乏以「韓門弟子」作為典故的情況：

矧我於韓門，忝與李漢儔。遺文念當序，舉筆心先愁。<sup>51</sup>

擬作韓門之弟子，未窺孔氏之門牆。<sup>52</sup>

叛去韓門，未應同籍湜之輩；游揚季諾，庶盛傳梁楚之間。<sup>53</sup>

功成刻楮謾三年，技拙空慚不可傳。晚事韓門稱弟子，終期幕府頌燕然。<sup>54</sup>

恐恐乎籍湜之莫保其終，以自負韓門之深媿。<sup>55</sup>

若使韓門加接引，未容籍湜獨升堂。<sup>56</sup>

<sup>48</sup> 計有功（撰）、王仲鏞（校箋）：《唐詩紀事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五二，頁1759。

<sup>49</sup> 軼名：《宣和書譜》（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4年），卷九，頁73。

<sup>50</sup> 洪邁：《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卷八，頁106。

<sup>51</sup> 黎廷瑞：《芳洲集》，載《鄱陽五家集》，收入《四庫全書》第1476冊，卷二〈次韻吳雅翁秋懷四首〉其三，頁二二下（總頁295）。

<sup>52</sup> 王之望：《漢濱集》，收入《四庫全書》第1139冊，卷十一〈通樓樞密啟〉，頁十五上（總頁809）。

<sup>53</sup> 周必大：《文忠集》，收入《四庫全書》第1147冊，卷二一〈謝舉狀啟〉，頁二四上（總頁227）。

<sup>54</sup> 衛博：《定庵類稿》，收入《四庫全書》第1152冊，卷一〈次韻謝王使君見贈二首〉其二，頁九上（總頁124）。

<sup>55</sup> 柳貫：《待制集》，收入《四庫全書》第1210冊，卷二十〈祭許益之文〉，頁三三上（總頁521）。

<sup>56</sup> 方孝孺：《遜志齋集》，收入《四庫全書》第1235冊，卷二四〈感舊九首〉其七，頁六四下（總頁720）。

一刺高名已自知，況傳冰柱雪車詩。韓門乍喜過張籍，王棹還應憶戴逵。<sup>57</sup>

韓門自有高軒過，賈孟詩篇總後塵。<sup>58</sup>

弟子韓門盛一時，投書卻悔少年為。官高不改憐才意，人道先生似退之。<sup>59</sup>

細繹以上材料，自歐陽修尊韓之後，「韓門弟子」漸為世所稱揚，成為後代引用的素材。其一，所提及「韓門弟子」，其意義更多突出「韓門弟子」的師承意義，此不待贅言；其二，可能是處於詩文簡稱的用意，有時則稱「韓門」而非「韓門弟子」。如對「韓門」與「韓門弟子」作仔細區別，拋除語義省略的因素外，倒可揣味二者之間的差別。一般來講，「韓門弟子」在韓愈所處時代以李肇《唐國史補》所言的「為求科第」的士子為主要對象，後來漸次涉及至張籍、孟郊、李翱等人。李商千〈「韓門弟子」小考〉一文說：「以韓愈當朝官四門博士為基準，以前與他相識的文人基本上都在志同道合的『朋友』之列，以後『投書請益』的舉子就在『弟子』之列。」<sup>60</sup>就韓門弟子在當時的意義來講，此說大體是對的，如此，孟郊、張籍、李翱等人則與韓愈處在朋友之列。實際上，在宋代，隨著韓愈的影響力擴大，及其道統、文學方面的價值得以發揚後，其「門弟子」的涵義發生變化，所包含的弟子範圍也隨之擴大。如宋人范俊〈寄上李丞相書〉說：「其後，韓愈起文弊於乖微，為諸儒標的。有從愈者，號稱韓門弟子。於是唐之文章鬱然有西漢餘風。」<sup>61</sup>這就明顯地將韓門弟子定義為文道傳承的一個團體了。而「韓門」之義，既可作為「韓門弟子」的省略，亦可模糊那些不好定義是否為「韓門弟子」。<sup>62</sup>至少可以說，在「韓門」內，可以為師弟子的身份，也有韓愈平輩的友朋，如張籍、孟郊等人，因為他們的思想活動都是在韓愈的指導下進行的。所以，僅稱「韓門」，雖不免顯得籠統，倒能更方便地將一些難歸屬的人拉進來，顯得較為融通。比如李紳，可稱為韓門弟子，但卻難以納入「韓門」。

有意思的是，後人以「韓門弟子」作為典故來使用時，不僅突出「韓門弟子」的文學師承，而且也以此來表示其人的師承關係，甚至有人以繼韓愈思想，並為其後世弟子的意圖，例如：

<sup>57</sup> 王世貞：《弇州續稿》，收入《四庫全書》第1282冊，卷十四〈寄張文學長輿〉，頁十九上（總頁182）。

<sup>58</sup> 吳綺：《林蕙堂全集》，收入《四庫全書》第1314冊，卷十七〈贈子嘗〉，頁四上（總頁526）。

<sup>59</sup> 查慎行：《敬業堂詩集》，收入《四庫全書》第1326冊，卷八〈呈玉峰少宗伯徐公四首〉其三，頁九上（總頁110）。

<sup>60</sup> 李商千：〈「韓門弟子」小考〉，《古典文學知識》2000年第1期，頁102。

<sup>61</sup> 范俊：《香溪集》，收入《四庫全書》第1140冊，卷十八〈寄上李丞相書〉，頁三下至四上（總頁146-47）。

<sup>62</sup> 參閱李最欣：〈李翱是韓愈弟子嗎〉，《文學遺產》2005年第3期，頁134-37。

廬陵郡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為本朝儒宗。繼之者龍雲劉公也。公諱弇，字偉明，居安福縣之龍雲鄉。文忠薨於穎，公方冠，不及從之遊。然斯文未喪，何害為韓門籍湜也。<sup>63</sup>

本朝王元之學白公，楊大年矯之，專尚李義山。歐陽公又矯楊，而歸韓門。<sup>64</sup>

宋三百年廬陵士以文章名世者三人：六一居士、後有雲龍劉氏、盧溪王氏，皆安成人也。周益公謂雲龍生，雖少後六一，不害為韓門籍、湜。<sup>65</sup>

陳后山、張文潛、二晁文字皆好黃山谷，有孫樵輩風氣，但太破碎。蘇不如韓，然其門下士如此數公，恐自不亞韓門。<sup>66</sup>

當日李翱、李漢、皇甫湜、樊宗師、侯喜輩，稱韓門弟子，各以文章自名於時。而孟郊、張籍從之遊，掉鞅詞席，猶蘇門之黃、秦、晁、張也。<sup>67</sup>

韓愈與「韓門弟子」間的這種關係，為後世所稱賞，後人亦以此比擬師屬承繼關係，樂意以韓愈及其門人的關係作類比，如蘇軾與「蘇門四君子」之間關係即同此類。再如上面所引的資料中，歐陽修遠紹韓門，而明人劉雲龍師承歐陽修，一脈相承，固可見韓愈的重要影響，更顯示出「韓門弟子」成為一種古文之道傳承的範式和榜樣。

「韓門弟子」的形成在韓愈生時以及以後都是十分值得關注的現象。韓愈固以雄傑之才振起於中唐之世，然而他籠絡弟子以及門人的宣傳造勢亦是他思想學術與文學創作得以傳播的一大重要因素。正如陳寅恪〈論韓愈〉一文所說：

退之在當時古文運動諸健者中，特具承先啟後作一大運動領袖之氣魄與人格，為其他文士所不能及。退之同輩勝流如元微之、白樂天，其著作傳播之廣，在當日尚過於退之。退之官又低於元，壽復短於白，而身歿之後，繼續其文其學者不絕於世，元白之遺風雖或尚流傳，不至斷絕，若與退之相較，誠不可同年而語矣。退之所以得致此者，蓋亦由其平生獎掖後進，開啟來學，為其他諸古文運動家所不為，或偶為之而不甚專意者，故「韓門」遂因此而建立，韓學亦更緣此而流傳也。世傳隋末王通講學河汾，卒開唐代貞觀之

<sup>63</sup> 周必大：《文忠集》，卷五五〈龍雲先生文集序〉，頁六下至七上（總頁582）。

<sup>64</sup> 晁說之：《景迂生集》，收入《四庫全書》第1118冊，卷十六〈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頁三四下（總頁317）。

<sup>65</sup> 邱濬：《重編瓊台稿》，收入《四庫全書》第1248冊，卷二一〈跋安成彭氏所藏盧溪手迹卷〉，頁三下（總頁421）。

<sup>66</sup> 李光地：《榕村語錄》，收入《四庫全書》第725冊，卷二九，頁二十下至二一上（總頁454）。

<sup>67</sup> 田雯：《古歡堂集》，收入《四庫全書》第1324冊，卷二八〈昌黎題辭〉，頁二下（總頁299）。

治，此固未必可信，然退之發起光大唐代古文運動，卒開後來趙宋新儒學新古文之文化運動，史證明確，則不容置疑者也。<sup>68</sup>

陳寅恪列舉六點「以證明昌黎在唐代文化史上之特殊地位」的因素，其中最後一點是「獎掖後進，期望學說之流傳」。<sup>69</sup>通過與韓愈同時代的「元白」主將比較，以及韓愈對宋代新儒學和古文運動的影響層面，陳寅恪指出了「韓門弟子」這一現象在當時及以後得以存在的必要性及意義。

## 結 論

「韓門弟子」的本初涵義，即如李肇所論中唐之時韓愈以引致為求科舉的那些後進之士而形成的現象。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韓愈本人歷史地位的轉變及影響層面的不同，人們因時所需，挖掘出其中更豐富的意蘊。較為典型的，則是宋人突出韓愈的道統思想與文章創作上的巨大作用，「韓門弟子」的原初涵義隱至後台，成為繼承和傳播韓愈道統和文統思想的一個整體，基本上形成宋以後人們對「韓門弟子」大體理解的方向。歐陽修等人對韓愈的極力推崇，正如王水照所論，「道統、文統問題成為宋初一些士人注意的熱點，它與文學結盟思潮，顯然屬於同一類文化理想的追求，同一種思維定勢和習慣：中國傳統士大夫一貫崇尚典範，仰服權威以及趨群合眾的文化性格」；而且宋人「討論道統、文統的落腳點在於為自身確立一個歷史位置，即為他們以繼承自命、建立自我權威謀求天經地義的神聖性。宋初不少人講道統、文統，跟孟子、韓愈一樣，都隱寓自繼道統之意，只是不曾直截了當明言而已」。<sup>70</sup>這無疑更有助於我們理解「韓門弟子」在宋代定型的深層社會文化原因。

<sup>68</sup> 陳寅恪：〈論韓愈〉，頁332。

<sup>69</sup> 同上注，頁319-32。

<sup>70</sup> 王水照：〈北宋的文學結盟與尚「統」的社會思潮〉，載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國際宋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266-67。

# A Study of the Protégés of Han Yu

(Abstract)

Qian Deyun

The term “protégés of Han Yu” first emerged in the mid-Tang. Its connotation as well as its influence have changed with the rise and fall of Han’s status in the Lat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and with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Ancient Prose Movement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erm was basically confirmed by Ouyang Xiu in the Song and roughly become the general opinion to this day. It is observed from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that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erm is a process of dynamic change; that is, the original meaning, closely related to imperial examinations, has gradually vanished, and the meaning of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literature been highlighted.

**關鍵詞：**韓愈 韓門弟子 古文運動 歐陽修

**Keywords:** Han Yu protégés of Han Yu Ancient Prose Movement Ouyang Xiu